

金耀基

中國政治與文化

Chinese Politics and Culture

增訂版

OXFORD

中國政治文化

金耀基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ISBN: 978-0-19-399293-1

1 3 5 7 9 10 8 6 4 2

中國政治與文化

增訂版

金耀基

扉頁題字：作者自題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增訂版導言

—

《中國政治與文化》是一九九七年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它是拙著《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姊妹篇。此二書是我四十年來探討中國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的部份成果。《中國社會與文化》研究的主題是中國經濟的與文化的現代化，而《中國政治與文化》研究的主題則是中國政治的現代化。

今本《中國政治與文化》增訂版，對原書作出甚大的調整。原書共八篇論文，拿掉了三篇；今本則增至十三篇，新加的有八篇，也即今本增訂版較原書增加達三分之二之數。

二

以下我對本書的十三篇文字作一導言，希望有助於讀此書者理解我各篇論述的學術旨趣與用心用力所在。(以下部份文字取自本書原版的「前言」)

〈中國之「現代型國家」的發展困境〉及〈中國政治傳統與民主轉化〉兩文之作是因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現代化理論所激發的。韋伯把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看作是現代化的重要組成。在學術界，韋伯對資本主義的理論受到廣泛注意，他對政治發展的理論則相對地未受到應有之重視，所重視的也只集中於他所講的「科層組織化」問題。當然，這與韋伯之國家理論未能全面完成而去世有關。對中國的現

代化而言，政治現代化是較經濟現代化更複雜與根本的。一九一一年帝國崩解之後，中國一直在尋找一個現代國家的體制。長期來，漢學家中有稱中國為「儒教之國」(Confucian state)者，實則，「儒教之國」在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真正存在過的是「國家儒學體制」(state Confucianism)。講中國的政治傳統，不是別的，正是這「國家儒學體制」，它不止是指儒家的政治文化，也包括了與「普遍王權」相結合的一套國家體制。「國家」這個概念在中國是遠早於歐洲出現的，但「社會」這個概念在中國是一「剩餘的概念範疇」。在「國家儒學體制」下，國家不但強於社會，也是涵蓋了社會的。

中國要發展「現代國家」體制，或要發展民主政治，一個重要的觀察點是，「國家」與「社會」之間是否有一適當的關係。更確切地說，相對於國家言，社會必需具有一自主性的存在。在社會學巨擘中，包括涂爾幹 (E. Durkheim)、馬克思，對「國家」都缺少真正的了解或掌握。馬克思「國家萎去」之說尤其是他理論中的盲點。唯一的例外是韋伯。韋伯在他政治社會學的著作中固然重視國家，他在中國的研究中更清楚看到在帝國系統中國家對「民間社會」(他觀念中的「市民社會」)的壓制。這是中國政治傳統的基本特質。二十世紀初，如前所述，滿清帝國土崩魚爛，國家儒學體制亦隨之解構，但是這並不意味「現代型國家」或民主共和政體的自然到來。這不止關乎帝國系統自我轉化之乏力，同時更與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的外在環境有關。當時中國在西方帝國主義侵凌荼毒下，救亡圖存壓倒一切，五四初起時的西方自由主義在反中國傳統上固然發生了作用，但在反帝國主義歷史大運動中，則失去了吸引力。社稷不保，國將不國，中國面

臨的是一全面性危機，也以此，以挽救國族危機為號召者，即國民黨與共產黨，先後為國人所風從，走上歷史舞台，決非偶然。一九四九後，共產黨與國民黨分別在大陸與台灣從事「國家建構」的工作。我在這兩篇論文中指出，共產黨與國民黨皆屬「革命政黨」，也都實行「黨國一體」制，但這兩個「黨國體制」仍有本質之不同，也因此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

在大陸，馬克思、列寧主義被賦予國家意理的地位，而與共產黨結合為「黨國體制」。嚴格言之，在中國大陸出現的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國家社會主義」在意理與結構上固與「國家儒學體制」迥然有異，但就「國家」對「社會」之有「全面的管轄宣稱」(史華慈語)而言，則兩者有歷史的承續性，所不同者，在前者，國家對社會擁有更全面的控制與管理，更徹底地壓抑了「民間社會」之發展，從而民主政治根本上沒有了着落。這情形在台灣則頗為不同：國民黨雖然是「黨國一體制」，但在孫中山的政治發展理論中國家的地位是逐次受到限定的。在軍政、訓政的階段，國家對社會固然有自上而下的干預權，可是，在進入憲政階段後，國家在經濟發展中雖依然有意識地扮演了「大力推動」的角色，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的色彩，但是就國家角色的定位言，它與「國家社會主義」有本質上的不同。這何以說呢？因為它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允許「民間社會」的存在。台灣的經驗所顯示的則更有一未嘗預期的結果。由於國家大力發展經濟，導致了一個越來越有生命力的市場經濟與民間社會，最後卒於出現社會可與國家抗衡，或國家與社會互為依存的局面，從而為

民主提供了一個得以生存與持續發展的結構性基礎。我希望這兩篇論文對於中國政治現代化，特別是政治傳統的承續與轉化作了一個較有系統性的詮釋。應該一提的是，〈中國之「現代型國家」的發展困境〉的英文原作“Max Weber and the Questions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in China”是一九九〇年七月在德國 Bad Homburg 舉辦的“Max Weber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的研討會中宣讀過的。〈中國政治傳統與民主轉化〉的英文原作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至三日日本橫濱舉辦的「漢字文化圈國際研討會」發表的。¹

三

「國家社會主義與中國知識分子」，這篇論文原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在紐約，由聯合報文化基金會舉辦的一個名為《中國歷史轉型期的知識分子》的學術研討會中宣讀的論文，與會學者除中國學者余英時、許倬雲、劉廣京、張灝、林毓生外，尚有艾森斯塔特、狄百瑞、史華慈及墨子刻。由於與會人數不多，故有充分時間論析辯難；是一次很值得懷念的經驗。原文由英文撰寫，我被邀寫的是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角色，毫無疑問，當代中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型期」，我基本的論點是，知識分子運作的空間和所能扮演的角色與其所生存的社會體系是不能分開的。一九四九年後，馬列主義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中國成為一個「全控型國家」(total state)，在嚴格的意義上，中共建立的不是「社

1 此文發表於沟口雄三、浜下武忠等編：《漢字文化圈の歴史と未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

會主義國家」(Socialist state)、而是「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思想當陽稱尊，在文化領域，全控主義更成為毛統治下的中國標誌。知識分子在這樣的社會體系下出現了高度，甚至是完全的依附性，知識分子沒有自己生存空間，都成為「體制化的知識分子」，在「政統」與「道統」(馬列主義)合而為一的態勢下，他們在文化上的功能，在最好的情形下，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眼光批評現實與理想間之脫離，長期以來，所謂二條思想路線之爭，名為爭正統，實則爭權力。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功能在一個沒有獨立生存的社會空間中是受到極大的限制的。一九七六年四人幫隨毛澤東的去世垮台，鄧小平發動了旨在發展生產力的「新長征」後，政治從社會作政策性的退卻，全控型國家的概念遭到揚棄，黨國之外開始出現雛型的「公共領域」，知識分子得以第一次對體制，甚至對「道統」提出質疑與批判，共產黨不再享有一九七八年前所擁有的文化霸權。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七八年後中國社會主義內部改造過程中，「體制化的知識分子」扮演了關鍵性的文化革新的角色。可以想見的，在十三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開闢下，中國的市場經濟將越來越獲發展。傳統性的知識分子可能為市場經濟所邊緣化，但中國在日益擴大的現代化社會中，知識分子將會在政治，特別是政治之外的領域得到新的定位，而更可見到新型的知識分子的出現。

〈科學·民主·現代化〉一文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在天安門前發生的群眾運動(簡稱「四五運動」或「四五事件」)所引生的。四五運動是指萬千群眾為了到天安門悼念周恩來而遭「四人幫」鎮壓，並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一事，此事

件之意義是反映了民心之變，文化意識之變，也即中國人民表達了對於毛澤東與四人幫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革命」路線之憤怒與揚棄，人民是以周恩來為「四個現代化」的象徵而去天安門悼念的。一九七八年四五事件獲得平反，《人民日報》把「四五」運動媲美於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並以「四五」是向「五四」所標舉的「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回歸。「四五」反映或代表的顯然是中共建國以來前三十年中的一個重要思潮：「四五」思潮中的最強音是對民主的要求，說到民主的要求這就涉及到一九七八年前中國社會主義（不論是馬列主義還是毛澤東思想定義下的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關係，也涉及到一九七八年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與民主的應有關係。對於這個歷史性課題的思考，我寫了二篇文章，一是〈中國文化意識之變與反省〉（此文收入拙著《中國社會與文化》增訂版牛津2013），二是〈科學·民主·現代化〉，在此文中我闡釋了科學、民主與現代化三者之關聯，特別指出如沒有或不能落實民主，則中國社會主義或中國現代化必難有全面健盛之開展。

〈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一文寫於一九八四年春，當時我所關念的中國民主是指中國大陸與台灣二地的民主發展的問題。中國(大陸)其時剛從文化大革命的「法西斯主義的專政」與「無政府主義式的自由」中走出來，極力糾正了從大躍進到文革以來的錯誤路線與政策，並把國家的發展中心放到經濟現代化上，但對於政治現代化則仍沒有在思維上有所突破，而當時，台灣則在經濟發展取得成就後，自願與不自願地走上了政治民主化之路，中央與地方的選舉已逐次實施，政治已有一番新氣象，但台灣的民主仍在初級階段，出

現了嚴重的「金權污染」及「走暴力邊緣」的民粹現象，誠然，在法治不彰情形下，台灣雖然走上民主之路，都可能走進「落伍民主」之陷阱。我此文之作，正在指出中國(大陸)或台灣都面臨不同性質的民主之困局，並探討其解困、脫困的可能發展之路。

四

〈政治現代化之突破與新境界〉、〈法治、共識與政治反展〉、〈中國民主政治之建構〉及〈後儒學文化中的民主探索〉² 四文是我對當時正在發生的台灣政治民主化所作的一系列的論述。以今日來說，台灣是民主了，比較地說，台灣今天是中國土地上民主實現最有成就的地方。應該指出，台灣之步上民主，不能說有其必然性，不能視為是理所當然。事實上，台灣由威權式的「黨國體制」轉到現代型的憲政民主，固然在客觀上有經濟文化的結構性因素，社會上，特別是居政治權力上關鍵位置的政治人物對民主之信念與作為亦是重要的主觀性因素。

誠然，台灣最後之轉向憲政民主原有孫中山先生政治發展的階段論(由軍政到訓政到憲政)為歸依，但真正要從訓政(特別當時台灣仍是一戒嚴期的非常體制)轉到憲政卻並沒有具體的路徑圖。台灣「黨國體制」之轉型涉及國民黨為一「革命政黨」的根本性格的轉型，即必須放下身段由一在政治權

2 〈後儒學文化中的民主探索〉英文原作為“A Non-paradigmatic Search for Democracy in a Post-Confucian Culture: The Case of Taiwan, R.O.C.”, in Larry Diamond,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3, pp. 139-162.

力上有宰制地位的革命政黨轉變為憲政體制下一個普通正常的政黨。這一轉型是西方民主發展中未曾有的，所以沒有一條可以遵循之路。再者，當其時，民主對台灣之發展是好是壞，黨內及社會精英的見解亦大有差異，而台灣初期雛型的民主，已出現「金權污染」及「走暴力邊緣」的種種敗象，致使認同民主理念的人亦不無疑懼，所以在七十年代後期與八十年代台灣朝野對民主既有期待，亦有保留。但一九八六年台灣政治強人、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告訴黨人，國人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毅然決然推動政治革新，包括解嚴，開放黨禁、報禁，無疑這是台灣走向民主化的重大步伐，我個人認為民主化不止絕對符合台灣長遠的利益，也符合國民黨根本的利益，我深信台灣經濟現代化取得大成就後再推動政治現代化是中華民國當有的歷史發展之路，也因此，我陸續發表了上面幾篇論述，同時，我也寫了數十篇政論性文字，後來出版了《中國人的三個政治》(1988)及《兩岸中國民主的反思》(1990)二個政論集。本書中的幾篇文字與二本政論集可以說是我在台灣民主發展的歷史中留下的一些墨跡，而我之所以在《中國政治與文化》增訂版中收入這幾篇文字是我相信它們對台灣與大陸仍有現實的意義。台灣已經民主了，台灣也因有了民主而更安定更自由了，但不能諱言，台灣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民主，而族群在每次選戰中都遭到操弄，實嚴重扭曲、傷害台灣民主之理性發展。對中國大陸所言，三十年來，中國在經濟現代化發展取得輝煌成就之後，正面臨一個政治改革的問題與挑戰，這已不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如何改革的問題。根本地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革命政黨，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者，也是

治國者，黨與國之合一不分與國民黨未實施憲政前的「黨國體制」無基本的不同。以是，台灣八十年代不流血成功的政治民主化的經驗，對中國大陸今後政治改革應該有啟發與參考的意義。

五

〈行政吸納政治〉與〈香港政治特性及其民主發展〉二文，是我對中國人的三個政治(即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中香港的政治的論述。

《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此文最早是在一九七五年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Asian Survey*《亞洲調查》中發表的，這篇文章可能是研究香港政治被引用最多的論文之一，這篇論文激發了不少學術上的辯論，也導引出過去二十年香港政治經驗研究中一些理論思維。這篇論文旨在解釋香港百年來政治穩定性的關鍵機制，也在論述香港政治模式的特殊的制度性要素，但是「行政吸納政治」這個現象未必為香港所特有，同時，也未必在任何時空條件下可以有助於政治的穩定。「行政吸納政治」是一種政府與社會精英的整合的政治形式，它之所以可能或有效，主要是在社會還沒有出現一定程度的「政治化」，一旦社會階層中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政治化時，則政府的統治層必須與社會之群眾有所互動與整合，始能維持社會之安定與活力，亦即須由「精英與精英之整合」轉向「精英與群眾之整合」，這也就是香港在七十年代之後所出現的民主化的過程。

「香港政治特性及其民主發展」是分析八十年代後香

港政治的一篇論文。香港社會的政治化起於七十年代，但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為未來香港前途定性後，在「一國兩制」的憲政框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為最響亮的政治的符號語言，英國在聯合聲明中將香港主權歸還中國，那是「還政於中」，但在「一國兩制」的憲政思維下，港英政府在治權層次上加速推行「還政於(港)民」的行政改革及代議政制，以此導致了香港進一步的政治化與民主化，出現了我所說的「政治市場」。事實上，中方雖然在主權上堅守「還政於中」的立場，它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思維，也必然會推促香港「政治市場」在「需求」與「供給」方面的擴大與深化。在香港政治化的過程中，港英政府有意識地淡出了「行政吸納者」的角色。而在過去十幾年中，中方則有意無意間扮演了新的「行政吸納者」的角色。不過，我想指出，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行政吸納政治」已不再是維持政治秩序最有效的制度設計了。在「一國兩制」的憲政架構下，一個有生命力的政治秩序，將是一個民主法治建構的秩序。

六

〈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一文，剖析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的複雜關係。民族主義是中國的現代現象，傳統中國沒有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而只有文化主義。清之前，亡國之嚴重性遠不如亡天下，亡天下即是亡文化，故儒生可忍亡國之痛，但決不能見文化之亡。蓋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乃因中國的文化。十九世紀末葉以後，在世界民族國家競爭中，中國

知識分子為了保民族、保國家已不再措意於中國文化之亡。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全面反文化傳統，所求者正為了新中國之出現。這種把民族國家置放在文化傳統之上的態度，在國史上是一大變。中共以馬列新文化來系統地取代傳統文化，以冀建立一社會主義新中國，態度尤為激進。五四以來的主流思想實不啻是「民族（國家）為體，文化為用」，這也即是民族主義已替代了過去的文化主義。無容懷疑，民族主義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意識形態之一，雖然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有「超民族主義」的本意與企圖，但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我們所見到的還是立足於民族主義的一個個國家，至於高舉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旗幟的共產主義國家，最後還是回歸到民族主義的本位。一九八九年後東歐、蘇聯的解體，赤裸裸的民族主義更在共產主義廢墟中一一抬頭。不過另一方面，在西歐，則一股新的超民族主義的觀念又正升起，西歐各個民族國家目前正企圖建立一個超國家的歐洲共同體。事實上，今日人類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如地球的生態危機，早已需要一種「地球人」的新思維。社會學者貝爾 (Daniel Bell) 對民族國家有這樣的看法，他說：「解決生命中的大問題，它顯得太小；解決生命中小問題，它又太大。」³ 有一點是相當肯定的，狹窄的民族主義不是通向世界和平的大路。就現代中國的歷史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民族主義之間始終存在着複雜的緊張性，中國要立足於現代世界，無可避免地必然是一民族國家；但中國真正的現代化，所需要的不應是一種毀棄文化傳統的民族主義，而應是一建基於中國文化的開放的理性民族主義。

3 Daniel Bell, "The Wor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3," *Daedalus* 116 (1987).

本書末篇〈儒學、現代性與亞洲的民主〉，原是一九九五年一月九至十六日在夏威夷由夏威夷大學與東西文化中心聯合舉辦的第七屆東西哲學家會議中宣讀的論文。⁴ 會議的主題是「民主與正義」。這次雖是哲學家的會議，但被邀請者卻不止於哲學家，我感到特別有意思的是，這個會議真正有東西學者的對話，辯詰雖然嚴厲，但溝通卻暢順無礙。我這篇論文，很明顯地，是討論現代性、民主及儒家文化之關係。當蘇聯為主導的共產主義體系瓦解之時，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ukuyama)認為我們正目睹「人類意識形態演進過程的終點，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將作為人類最後政體形式而得普遍實現」。我們這裏姑且不去考慮西方「自由主義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是否為最可欲的政體形式，更根本的問題是西方的自由主義的民主是否具有普世化的可能性？這就涉及到西方現代性是否就是現代性的普世模式問題了。當然，這就不能不關乎到現代性與文化的關係。無可置疑，自啟蒙運動以來，民主的確已成為最受普遍接受的一種政治形式。但民主之受普遍接受是一回事，「自由主義的民主」之外是否不可能再存有其他的民主形態，則是另一回事。事實上，自由主義的民主是「自由主義」與「民主」的混合物。這二個組成要素具有不同的歷史文化根源，而這二者之間一直存有緊張與複雜關係。我的看法是，「民主」的理念已漸漸在

4 〈儒學、現代性與亞洲的民主〉英文原作“Confucianism, Modernity and Asian Democracy”，刊於 Ronald Bontekoe & Marietta T. Stepaniants eds., *Justice and Democracy: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中國，乃至亞洲受到肯定，但「自由主義」，特別是與自由主義分不開的「個人主義」則與儒家文化有相涵性，也有衝突性。儒家的文化價值與自由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它們對「個人」與「社會」之關係的定位有著根本的不同的取向，雖然二者都珍視個人的尊嚴與價值，但儒家文化並不把個人與社會視為相反的兩極，儒家的價值觀不能簡單地概括為一種集體主義，而它肯定不是個人主義。儒家的價值觀與西方的「社群論」(communitarianism)實較相契。民主可以與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相搭配，民主也一樣可以與「非個人主義」的儒學成為夥伴。無論如何，政治現代性脫離不了文化背景，作為政治現代性要素的民主也無可避免地會與儒家的文化相結合，這不止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而且在經驗上也正在發生。

八

最後，在《中國政治與文化》增訂版問世之際，我特別要感謝主事牛津大學出版社中文學術出版的林道群先生，這個增訂版之得以與讀者見面是道群兄的建議與鼓動。從他第一次向我邀稿迄今已整整二十年了，自一九九二年以來，他先後已為我出版了九本書(包括《劍橋語絲》等三本散文集)。我始終欣賞敬佩他編輯的眼光和專業的修養。當然，我更珍惜我們二十年往還的情誼。

2012年11月於香港

目 錄

ix	增訂版導言
1	中國之「現代型國家」的發展困境 韋伯的「國家」、「社會」互動觀 價值基礎和結構要素 國家的危機：現代型國家的探索
29	中國政治傳統與民主轉化 一統性「國體」與君主制「政體」 國家儒學體制：政統與道統關係 「普遍王權」觀：國家與社會 「國家儒學體制」之解體：現代國家與政治新形式的探索 「黨國體制」之轉化與民主化歷程
49	國家社會主義與中國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和共產主義革命 國家霸權下的知識分子 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 中國的「四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
79	科學·民主·現代化 思想的狂飆運動 四五——向五四招魂 馬列主義與現代化 科學與科學主義 不確定原理、謙虛與容忍 民主與社會主義 「實質」的理性與「程序」的理性
95	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